



东方·剑桥 世界历史文库
Orient &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Library

新加坡史

康斯坦丝·玛丽·藤布尔 著 欧阳敏 译

A 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 1819-2005

C. M. Turnbull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东方·剑桥世界历史文库
Orient &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Library

A 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 1819-2005

新加坡史

康斯坦丝·玛丽·藤布尔 著 欧阳敏 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加坡史/(英)藤布尔著;欧阳敏译.—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2016.4

(东方·剑桥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7-5473-0925-4

I. ①新… II. ①藤… ②欧… III. ①新加坡—历史
IV. ①K3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4055 号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1-043 号

A 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 1819-2005 by C. M. TURNBULL
Copyright: © The Estate of C. M. Turnbul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NUS Press Pte Ltd,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张芝佳
技术编辑:徐儒静
装帧设计:罗洪

新加坡史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021)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960 毫米 1/16

字 数:580 千字

印 张:44.25

版 次:201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925-4

定 价:7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021)52069798

前 言

本书第一版是在 1977 年出版的,那时候,新加坡独立才 12 年。但就在那短短的十几年里,这个新生国家的领导人解决了许多在当时看来无法克服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方面的难题,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他们所取得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但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在很大程度上仍只能说是各个不同民族混合在一处的产物,尚未真正融合成一体。

xi

本书的第二版则将这个故事又更新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与高歌猛进的独立初期相比,这段时期显得波澜不兴,没有发生什么大事。虽然 80 年代中期新加坡曾经历了一次短暂的经济衰退,但总的来说,这些年里,新加坡经济发展迅速,物质成就斐然,使这个共和国成为动荡不安的世界中最为繁荣稳定的国家之一,享受到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前所未有的和平与安宁。

在结合新史料和新近学界研究的成果后,本书作者对过去进行了重新审视,使这一新版本在修订原来版本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时间跨度也拉长到 2005 年,新加坡独立 40 周年之时。在这些年里,曾掌控国家由殖民地向独立国家转变进程的老一代领导人隐退,更年轻的一代开始成为中流砥柱,各种变化也随之发生。而这些,正是新版本扩充部分所关注的内容。新一代的任务是,找到能够

延续前辈缔造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现状的道路。20世纪90年代末,东南亚遭受了一场严重而持久的金融危机,这使他们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而在新世纪伊始,他们又受到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此外,他们还要学会如何去面对一群新富起来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这群公民厌恶过去受到的种种束缚,渴望对社会建设事业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xii 叙事史最近已经在学界失宠,取而代之的是,强调模式和问题意识,更偏好主题研究。而在此期间,史学界与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合作丰富了对新加坡(尤其是对其独立后时期)的理解。但这并不能完全取代对这样的一种编年史的需求:恰如其分地关注并描述每个前后相继的历史阶段,试图将个体和事件置于时间推移的进程中,同时还要考虑到人类的弱点和“意想不到的法则的作用”。

在本书的第一版中,如今已故的柔佛苏丹伊斯梅尔阁下曾热情地从自己的家庭相册中为我翻印了一张他的曾祖父、天猛公易卜拉欣的照片。已故的 Eric Jennings 先生慷慨地准许我使用他收集的照片。

本书前几版的撰写要感谢多方:李氏基金会(Lee Foundation)的资助,新加坡大学(University of Singapore,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图书馆、东南亚研究院(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新加坡国立图书馆和新加坡档案馆,以及香港大学图书馆,还有英国的公共记录事务局(Public Record Office,现为“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印度事务局图书馆(India Office Library,现为大英图书馆中的“印度与东方档案”[Oriental Collection in the British Library]),以及牛津大学的罗氏图书馆(Rhodes House Library)的相助。我也非常感谢它们此后又持续为我提供的帮助。

在早期修订本书之时,1989年在杜汉大学做哈特费尔德访问学者(Hatfield Fellow)、1993年在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做档案学者(Archival Fellow),以及1995—1996年在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

院做访问教授,这些经历都为我提供了诸多便利,对此我非常感激。我还要感谢《海峡时报》当时的总编辑 Cheong Yip Seng 以及前资料室主任 Lye Choy Lean,他们在我 1993—1995 年集中研究《海峡时报》150 年历史的那两年中,对我帮助匪浅。我还要感谢剑桥丘吉尔档案中心主任 Allen Packwood 的帮助,以及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东南亚资料员 Nicholas Martland 多年来的支持。

此外,我还要感谢以下机构、会议及其负责人,感谢他们邀请我提交论文并为我提供与学界同仁共同研究探讨的机会:香港大学的历史系以及亚洲研究中心,吉隆坡的马来西亚遗产学会(Malaysian Heritage Society),2002 年在槟榔屿由 Khoo Salma Nasution 和 Neil Khor 组织的槟榔屿故事研讨会(Penang Story conference),以及其他在正式与非正式场合,在新加坡、吉隆坡和槟榔屿与研究前海峡殖民地学者的会晤。

我也有幸于 2006 年应邀前往新西兰和新加坡作了一次收获颇丰的访问。我首先在“东南亚会议:过去、现在与未来”(由奥克兰大学为纪念荣誉退休教授 Nicholas Tarling 75 岁寿辰而举办)上陈述了我的观点;其后我又得到机会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做研究并开设了一个研讨班,对此我要感谢当时的系主任 Anthony Reid 教授和副主任 Chee Heng Leng。我也很感谢能有机会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的教员们进行讨论,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的马来西亚资料室室长 Tim Yap Fuan。

2007 年我参加了 Emma Reisz 博士和 Thum Pingtin 在剑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组织的一场别开生面的“讲述国史:三十年来的新加坡”研讨会。这个研讨会主要召集了一批新加坡和其他地方的年轻学者,撞击出了许多新的观点火花。同年晚些时候,我荣幸地得到机会,从其他不同的角度看待新加坡的历史:应 Ooi Keat Gin 教授之邀,为槟榔屿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的一场研讨会呈递我的一篇文章,并在伦敦参加了由 Ben Murtagh 博士组织的一场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主办的关于“英国与马来世界”的研

讨会议。

John Bastin 博士和 Karl Hack 博士曾阅读过本书部分手稿,并提出了宝贵(有时甚至很严厉)的意见。他们两位,以及前面提到的诸位新加坡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士,多年来曾慷慨地与我分享他们的见地,并给予我鼓励、意见和支持,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但他们对本书中的任何观点和错误都不承担责任,我将全权负责。

我要最真挚地感谢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的员工们的耐心和宽容,尤其是我的编辑 Paul Kratoska,他为本书的编辑花费了大量心血。

康斯坦丝·玛丽·藤布尔

牛津,2008年8月

缩 略 词

xv

AMDA	《英马防务协议》
ANZUK	澳新英防务同盟
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
BMA	英国军政府
CAB	内阁文件
CO	殖民地事务局
COD	殖民地事务部所发文件
EIC	东印度公司
GD	总督所发文件
JIA	《印度群岛公报》
JMBRAS	《皇家亚洲学会马来西亚分会会刊》
JSBRAS	《皇家亚洲学会海峡分会会刊》
JSEAH	《东南亚历史杂志》
JSEAS	《东南亚研究杂志》
JSSS	《南洋学报》
MCA	马来亚华人公会(后更名为“马来西亚华人公会”)
MNC	跨国公司
MP	议员

	MPAJA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NCMP	非选区议员
	NMP	官委议员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PAP	人民行动党
	PRO	英国公共档案局
	PUTERA	人民联合阵线
xvi	SEATO	东南亚条约组织
	SEP	《新加坡自由西报》
	SSR	海峡殖民地档案
	ST	《海峡时报》
	UMNO	马来民族统一机构
	WO	陆军部

第一版导言

1819年,斯坦福·莱佛士爵士(Sir Stamford Raffles)在众人的一片反对声中,凭一己之力创建了近代新加坡,这是它的独特之处。虽然是一个无人期盼的孩子,一个被硬塞给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孩子,新加坡却成功地存活下来,并走向了繁荣昌盛。不过,它的成长故事并不是一帆风顺、毫无挫折的。它的繁荣,有时甚至它的生存本身都多次受到威胁。

1824年,东印度公司购买了整座岛屿,英国对新加坡的合法主权得到承认。两年后,它成为东印度公司所辖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的一部分,随后又成为这块殖民地的治所。海峡殖民地在1867年又转为英国王室直辖殖民地。在这些年里,新加坡的地位始终不太稳固,但随着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及英国的政治影响力在19世纪最后25年里扩展到马来联邦富庶的内陆地区,新加坡作为世界上最富足也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的地位就此彻底得到巩固。它在1946年时单独成为王室直辖殖民地,1955年首次获得一定程度的行政管理权,在1959年则获得了内务自治权。1963年,它作为新生的马来西亚联邦的组成部分赢得独立,但在联邦中度过了纷纷扰扰的两年后,它被驱逐出联邦,由此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

单独就新加坡历史展开的研究相对而言还比较少见,直到相当晚近的时候,她的历史还一般被纳入马来亚的历史一并研究。早期撰写新加坡史的种种尝试进展不明显。莱佛士本人曾经打算编纂一部著作,论述这个贸易中转站的起源和早期管理体制,但他的手稿和一些论文在 1824 年的一场海难中遗失。后来,新加坡的第一任总检察长托马斯·布拉德尔(Thomas Braddell)筹划撰写一本新加坡史,但最后却没能成书,他只于 19 世纪 50 年代在《印度半岛公报》(*Journal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上发表了一系列官方文件集锦。

xviii

英国从 1874 年开始对马来诸邦实行政治干预,而马来半岛的锡矿和橡胶产业日益发展,这些都吸引了官员、开发商和作家们的注意力,使他们开始忽视海峡殖民地。富有进取心的新一代殖民地官员开始专注于马来诸邦。1954 年,在成为直辖殖民地八年后,新加坡终于有了自己的政府机构。即便如此,对大多数想要闯荡一番的官员们来说,在这块殖民地任职只是权宜之计,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离开这里,前往内陆地区接受更富有挑战性,也更能享受异国情调的职位。此外,精通华人事务是在新加坡任职最合适的背景条件,但这却会妨碍升迁至更高的职位。因此最有雄心壮志的公务人员都选择学习马来语,有学术抱负的人则集中研究马来诸邦的历史、风俗和文学。

理查德·温斯泰德爵士(Sir Richard Winstedt)是马来亚英国殖民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他就曾将 1941 年以前的新加坡历史轻描淡写地称为“一派平和的商业发展景象,仅有几年受到阻碍了海上交通的海盗及华人帮会火并的影响”。¹这种看法实在过于简单化。新加坡的历史中有很多矛盾和变迁,有些以可能性法则来衡量的话,甚至有些匪夷所思。

近代新加坡的创立取决于莱佛士,这是个人力量取得的激动人心的胜利,而它在二战后的历史则色彩斑斓,充满各种佚闻和插曲、人格与意识形态的碰撞。在这之间漫长的成长期,则往往被人们轻视为乏

味无趣得如同一潭死水。可是这潭水并非如此乏善可陈。新加坡国家生活那平静无波的表面下,却酝酿着融合与变迁的潮流。它们将塑造一个独特的社会,使得新加坡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如今能在全球发挥着远远大于其国土面积的商业和政治影响力。

近年来,多种因素也抑制了撰写新加坡史的尝试。1965年,新加坡有些措手不及地独立成为一个国家,它的主要注意力都放在培养民族意识和确保未来的繁荣昌盛上。为了保证人们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新加坡人集中关注于当下和未来,而忽视了其历史。因为这段历史源自西方的殖民统治,以及多种同样来自异文化的亚洲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但民族国家的建设,最终需要创建一种基于民族国家发展历程的坚实认同,这种发展历程与单纯的个人旨趣大不相同。

本书以1819年为起点,追溯了新加坡的历史。那一年,这块近代殖民地正式创立。故事终于1975年,这一年,新加坡刚经历了独立后的第一个阶段。在大多数新独立的国家中,获得政治上的独立与真正摆脱殖民时期经济和防卫上的诸种成规或摒弃殖民时期的行事方式之间,是有一个时间差的。一直到1973年,随着货币、证券交易所和橡胶市场分立,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最后的正式联系纽带才切断。同年,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英国马来西亚协会(British Malaysia Association)解散,英联邦安全防卫体系正式崩溃。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1973—1974年石油危机爆发,1973年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巴黎和平协约》签订,两年后共产主义在柬埔寨和南越获胜,美国一败涂地,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迫使新加坡在一个变幻的世界环境中寻求自己的新形象。它需要与同地区的邻国互通有无,学会与远东地区与之相异的意识形态共处,并学会面对新的经济形势。新加坡一直致力于加入发达工业国家的行列,可是,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忽然之间,贸易环境却不再青睐这些国家。

在短期内,任何一种“标准版”新加坡史问世都不大可能。因为这里的文化背景和个人经历实在太多元化,任何一个外国人或任何一个

族裔的新加坡人都无法代表整个新加坡社会来记事叙史。作者作为一个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生活了将近 20 年的外国人,怀着对新加坡社会的个人感受,撰写了这本个人化的历史阐释著作。作者希望,本书的种种局限、疏漏与不足之处能够激发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等各领域的学者来填补空白,改正错误观点,从而使我们最终能更加了解这个年轻国家的历史背景。

香港,1975 年 9 月

导 言

1

“新加坡没有历史！新加坡的历史将从现在开始！”1965年8月，新加坡人突然发现他们被迫独立，从那时开始，这句充满自豪感的话，就成为非常流行的口号。当时，所有的一切都面临改弦更张，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直觉反应是摒弃过去的历史，认为历史与现在并无关联。英国历任总督的画像都被取下来放进了地下室，还有人呼吁，要把莱佛士的雕像扔到新加坡河里去。

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当时的确面临着艰巨而紧迫的经济和防务方面的问题，它还需要从无到有地创造人们对一个民族国家的归属感。但否认过去并不能为创建一种积极自信的认同感提供坚实的基础。在此之前，新加坡一直被视为某个更大的实体中的一部分：海峡殖民地、大英帝国，或之后的马来西亚联邦。但此时则需要寻找让这个岛屿能自成一体的一些东西。正是想到这一点，我开始着手撰写新加坡的历史。本书的第一版于1977年出版，追溯了这个岛国直到独立后第一阶段结束时的历史。第二版则补充叙述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如今，在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走过四十年历程之际，考虑到新加坡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已发生变迁，现代史学也发生了变化的事实，重新审视新加坡的过去正当其时。

在新加坡独立之初，人们对新加坡在成为殖民地之前的历史知之

1

甚少。本书的第一版是从 1819 年莱佛士抵达新加坡开始叙述其历史的,仅简单回顾了一下有关这个岛屿晦暗不清的过去的传说,以及接近于传说的某些资料。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人民行动党(PAP)政府也决定从 1819 年开始追溯新加坡的历史。按照当时的外交部长信那谈比·拉惹勒南(Sinnathamby Rajaratnam)的说法,这是因为,新加坡人零散地来自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中东地区,想要通过把历史追溯到这几个来源地,来塑造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任何一种这样的尝试都可能带来风险,将这个城市国家变为“种族和社群冲突,以及那些作为新加坡的移民供给国的更为强大的国家施行干涉主义政策引起的无休止争斗的战场”,所以政府必须要“慎重选择在一个多文化社会中倡导何种对过去的认识”。¹为了找寻一个相对中性的象征,当局作出了一项出人意料的,也是许多人不喜欢的决定:不仅保留莱佛士原来的那尊雕像,而且还正式承认他为新加坡的创立者,并在当年他登陆的河岸边为他竖起了第二尊雕像。“我们决定将莱佛士命名为新加坡的创立者,这是正确借用历史的一个例证……我们接受了一项史实。”²

在从殖民地历史中汲取了其他一些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之后,同时也对来到新加坡的亚裔先驱们坚韧不拔的精神表达了崇高的敬意之后,新加坡人开始全力以赴地为未来而奋斗:重构经济、创建武装力量、改善这个“艰困的社会”(rugged society)。政府公务部门一反传统,不选用历史专业出身的人从事管理工作,而招募技术专家以引领现代化建设。1972 年,历史科目从小学课程中删除,取而代之的,是当局认为更有利于培养未来的劳动力群体的科目。

那是一段激情飞扬、充满活力的岁月,新加坡人的自信心在逐渐增强。但是,20 世纪 70 年代所取得的“辉煌的经济奇迹”,却渐渐勾起了人们对只关注当下的态度的忧虑。政治领导层担心,对过去的无知会使年轻一代把稳定、繁荣及种族和谐视为理所当然,认识不到这一切的得来是多么不易,失去却又多么容易。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政府的部长们在公开讲话中不断劝诫国民,不能松懈,要继续努力,要灵活变通,不断更新和充实自己以应对新的挑战,避免某些先富起来的社会很

快一蹶不振的命运。“生活在我们如今这种富足、高品质的现代化生活环境中,很容易就会忘记过去”,³“一个国家取得的成就越大,就越有衰退和崩溃的危险”,⁴“我们这个国家并没有一个注定好的未来,明天需要靠我们自己去开创,靠我们全心奉献的精神和为共同的福祉而奋斗”。⁵

1985年的经济衰退,是新加坡共和国自独立以来遭遇到的第一次严重挫折,但它却也提供了机会,可以进一步去除新加坡年轻一代的骄傲自满情绪。时任贸易工业部代理部长的李显龙(Lee Hsien Loong)警告国民说:“我们必须清楚新加坡是怎么取得今天的成就的,只有这样,我们才决不会忘记,这一切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也不会忘记,要维持今天的繁荣就必须以勤勉不息作为代价。”⁶

积极的现代化政策恰恰对其想要加强的国家认同建设和国家团结构成了威胁。提倡以英文作为管理和教育语言带来了形成文化真空的风险。为了给新城镇建设和高楼大厦的兴建让路,乡村社区(*kampung*)遭到全面破坏,城镇原有的邻里结构全面解体,这些都使旧日社区的凝聚力和生活方式的实体证据消失殆尽。“人们越来越担心,我们可能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新加坡,它闪闪发光,但旧日痕迹无踪可寻,形同泡沫。”⁷“如果我们不想将来变成一个无根的转瞬即逝的社会,尽可能地保存我们的历史就非常重要……我们继承了至少160年人们为建设新加坡而努力的奋斗史。”⁸“新亚洲人”一词流行起来。它描述的是理想的新加坡人的形象,它将把西方的现代性与从文化传统继承下来的“亚洲价值观”结合起来:“虽然新加坡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我们的民族历史悠久,不管我们在种族上属于华人、印度人、马来人还是欧亚裔。我们决不能失去对过往历史的感知,因为在危急来临时,它将成为最强的精神力量的源泉。”⁹

1991年,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确立,其基本内容为下列“共享的价值观”:国家高于社群,社会高于个人,家庭是最基础的社会组成单位,社群要扶助各个个体,寻求共识,避免冲突,寻求种族和宗教群体间的和谐。新加坡人曾自信能在独立后一代人的时间里实现国家的团结凝

聚,但随着 20 世纪接近尾声,这种信心逐渐减弱,让举国上下,尤其是年轻人了解“新加坡的故事”,成为官方的政策。¹⁰为了纪念新加坡沦陷 50 周年,1992 年,新加坡国立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名为“当新加坡名为昭南岛时”的展览,2 月 15 日则被定为遗产日,以强调战争留下的遗产,即“岛上各族群的人们开始凝聚团结在一起,开始依恋这片土地”。¹¹这次展览突出展示了新加坡最后的保卫战中那些英勇的抵抗行动,这些行动是由马来军团中的亚裔成员、义勇军士兵们以及达尔军完成的。在接下来的数年间,随着越来越多的战争遗址对公众开放,“依赖他人必将失望这一贯穿始终的主题”¹²,以及新加坡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保护自身的观念,开始逐步深入人心。

1997 年,时任副总理的李显龙启动了一项全国性的教育项目,加大了历史科目在学校课程中的分量,以消除年轻人对历史的无知状态,并鼓励他们“团结一心,携手共进”。1998 年,李光耀出版了他的回忆录的第一卷,名为《新加坡的故事》,这一年晚些时候,新加坡遗产局(Singapore Heritage Board)举办了一次大型多媒体展览,名字也叫“新加坡的故事”。它们共同塑造了所谓的有关新加坡历史的“正统版本”:新加坡沦陷,这是一场大灾难;日据时期,面对着共同的艰辛和苦难,各个社群团结了起来;上一代人付出艰苦的努力、作出巨大的牺牲,克服了艰困、贫穷、左翼势力引发的暴力,以及种族间的冲突,才把新加坡转变成为一个稳定、繁荣与和谐的社会,这一切需要年轻人团结一心来捍卫。在展览的开幕典礼上,总理吴作栋(Goh Chok Tong)作了这样一番评论:“在新加坡的故事里,一种挥之不去的威胁是,新加坡是如此脆弱,又受到如此多的限制。这种脆弱性和局限性还将长期存在下去。”¹³

当局邀请新加坡人为这则故事变得更加丰满作出贡献,一时之间,出现了讨论批判“正统版本”的热潮。李光耀回忆录的第一卷非常直言不讳,他的言辞丝毫没有因为所述均为数十年的旧事而变得柔和。它的出版迅速在马来亚引起了一阵骚动,李光耀以前的多位政敌、西方的自由主义学者,以及新加坡的年轻人都对人民行动党的叙事进行了挑